

臺灣社會學刊，2015年6月
第56期，頁151-183

研究議題討論

修養、位移與大迴路： 本土行動理論的三種路徑

王志弘

王志弘 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通訊地址：臺北市大安區羅斯福路四段1號 工學院綜合大樓312室 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Email: cherishu@ms32.hinet.net。作者感謝本刊匿名審查人與編委會的指正與建議。
收稿日期：2014/8/6，接受刊登：2014/10/4。

中文摘要

本文討論三種建立本土一般社會理論的嘗試：葉啓政的知識社會學批判與內省修養行動、林文源的漂移實作本體論與位移行動理論，以及謝國雄的「結構力量－呈現樣態－中介行動」大迴路。這些理論化都立足於對結構與行動二元論的批判，並採取偏向行動之自主性或積極中介作用的立場，拋棄靜態僵化的結構概念。結構概念若非遭致取消，就是轉化為多層次、變動、過程與關係，或是受到行動中介的產物等，偏向於建構論或非實體化觀點。本文則從批判實在論立場，主張過度偏袒行動、將結構非實體化，以及消弭結構與行動的二分，可能忽略了結構的慣性、內在變遷或因果力量，造成結構的低度理論化；或者，在強調行動與結構的連續性及難以二分之際，反而將行動納入尚未釐清的結構中。因此，批判實在論的結構與行動雙元實體觀，仍是值得參照的另一條理論化方向。

關鍵詞：結構、施為、行動、結構能力、批判實在論

**Self-cultivation, Displacement and Great Circuit:
Three Approaches toward Local Action Theory**

Chih-Hung WANG

Graduate Institute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ree attempts at establishing a general social theory: Chi-Jeng Yeh's cultivated introspection based on knowledge sociology, Wen-yuan Lin's drift ontology and displacement action, and Gwo-Shyong Shieh's great circuit model. All three are based on critiques of structure-agency dualism. Each researcher has adopted a position prone to agency autonomy and active mediation, while abandoning the ossified structure concept. They describe structure in terms of multi-layered and dynamic processes and relationships. In contrast, I use a critical realist perspective to argue that excessive preference for action and a non-substantive structural concept, as well as the elimination of structure-agency dualism, might result in overlooking inertia and the latent force of a structure, thus leading to structure under-theorization. Accordingly, a dualistic structure-agency perspective of critical realism still offers a viable alternative.

Keywords: Structure, Agency, Action, Structural Capacity, Critical Realism

一、前言：本土行動理論的追尋

1980年代晚期以來，「本土」、「在地」或「本地」，成為理解臺灣社會轉變的關鍵詞。以時間縱深來看，從傳統、現代，到本土的轉折，是串接百餘年來臺灣社會變遷的重要線索。當然，這條線索彎繞曲折，內蘊了衝突。從中國、漢人或原住民傳統的鄙棄或保存，到西化、工業化、都市化的現代追尋與批判，以迄全球化趨勢下，涵蓋國族意識與社區營造等不同尺度的地方回應及抵抗，皆持續糾纏，而非單純替換。

傳統、現代與本土的更迭轉化，展現於許多領域，如文學（新舊文學之爭、現代主義、鄉土文學論戰、地域文學）、建築（文化守成論、現代主義建築、保存運動和地域建築）、音樂（民族音樂、西洋古典和流行音樂、校園民歌、本土獨立音樂）、農業（傳統農業、現代機械與化學農耕、地方有機農作）等。隨著現實的轉變，學術界也有知識生產的現代與本土轉向，展現於社會學在1960至1970年代汲取結構功能論和西方現代化理論，以及1980年代以後，社會科學中國化與本土化的各種嘗試（湯志傑 2008），倡議關注本地經驗脈絡、提出在地發問、創製本土研究方法與工具，以及建立本土理論來補充或批駁歐美理論及其意識型態（葉啓政 1991: 3）。

本文關注本地社會學領域中，建立一般理論的企圖。它們主要針對西方社會理論之**結構**（structure）與**行動**（action）或**能動性**（agency，或譯施為、行動能力）的張力，提出了從地方脈絡出發的不同理論化方式，但似乎較偏重於行動面。行動的優先地位，可能透露了面臨西方及全球結構力量時，在地必須有所反省與反應的焦慮，或者，面對作為限制的結構或支配性系統，立意尋求抵抗與變革的可能。因此，本土行動

理論的構思，或許反映了臺灣作為邊陲社會的力求振作心態，以及社會學界的抵抗與變革精神。

林文源於2014年出版《看不見的行動能力：從行動者網絡到位移理論》（後文簡稱《看不見的行動能力》），是建立本土行動理論的最新成果。他在書中回溯了臺灣學界探討相關議題的先驅貢獻，其中的葉啓政（2000）和謝國雄（2013a），也有建立一般理論的企圖，但林文源並未深究他們的觀點。本文則主張，三位學者貢獻卓著的本土行動理論追索，呈現出三種不同的理論化策略，即葉啓政的知識社會學批判與內省修養行動、林文源的漂移實作本體論與位移行動理論，以及，謝國雄的「結構力量－呈現樣態－中介行動」大迴路。他們在結構與行動的辯論中占有不同位置，但偏向於倡議超脫僵化結構的行動觀，甚至將結構予以非實體化。然而，他們卻很難避免以其行動觀持續跟結構概念對照和互構，也有可能走過了頭，輕忽了結構概念的解釋力量。比較三者理論建立途徑的異同，不僅能釐析本土行動理論的多元途徑，也能察知值得繼續努力填補的闕漏之處。尤其，有鑑於三者皆傾向於關注本土行動實作與行動概念的理論化，本文則主張，應當持續思考本地社會結構的特質、機制和概念化。

本文評論乃基於**批判實在論**（critical realism）保留行動與結構二元論的觀點，以利通過對照，彰顯本土行動理論的貢獻和限制。批判實在論作為一個哲學與社會理論潮流的譜系很複雜，相關概念繁多，本文不擬深究。基於評價本土行動理論之結構與行動概念的要旨，本文只挑選英國馬克思主義學者Alex Callinicos專論結構與能動性議題的《創造歷史：社會理論中的行動、結構與變遷》（*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2004）作為評論之參照。

批判實在論主張，知識對象乃相對或絕對獨立於認知者之知識建構

而有待深入研究（於是，有結構與行動的基本二分）。此深入研究具有批判、辯證、進步、自由與解放等特徵，以及，兼納客觀真理和主觀規範的目標（Nielsen 2007），因而與實證主義和後結構主義立場皆不相同。簡言之，批判實在論批評實證主義偏執於歸納可檢測之表象經驗的科學程序，忽視了通過批判理性方能掌握的深層結構及其因果力量（因此，現實具有相對穩定的層次與特定構造）。另一方面，後結構主義強調了語言或符號系統的建構力量，卻可能流於文本化約論，拋卻了具因果力量的結構觀，或者，在強調變動、關係、過程與跨界等動態之餘，混淆了行動與結構這兩個不同的實體層次，甚至將社會世界非實體化。除了強調具有因果力量的結構，批判實在論也重視能夠獨立行動的個體，但這並非淪為行為主義式的個體原子論；結構與行動者乃是存有上分離但彼此密切相關的實體。¹

Callinicos深具馬克思主義色彩的批判實在論版本，便著力於辨析結構和行動的關係。相對於盛極一時的結構馬克思主義，以及後結構主義對於意向性主體的批判，他主張，結構的解釋與意向的解釋同等重要，亦即結構與人類行動兩者皆具有解釋力，而且是擁有不同特質的實體。然而，為了避免強調行動者而淪為方法論個體主義，他提出**結構能力**（structural capacities）概念，指出個體的行動能力乃取決於其在社會結構中占有的位置；因此，結構並非只是限制，還涉及了力量的賦予。

¹ 關於結構和行動相對獨立但錯綜的關係，例見Jonathan Joseph與John Michael Roberts歸結的批判實在論存有論，由三個向度構成：結構（賦予客體獨特屬性的不可變特質）；發生機制（因客體之結構而擁有的力量，可能於開放或偶然之條件下與其他客體一同作用）；以及，實踐（特定客體之可變領域中的行動與社會關係，它們受到客體之結構與機制的部分決定，但不能完全化約為這些結構與機制）（2004: 2）。

再者，作為**力量與趨勢**的社會結構，必須通過人類的意向性行動來運作（Callinicos 2004: xx-xxi）。

詳言之，Callinicos的行動觀乃採取他所謂的正統行動者概念，即能從事有意識、目標導向活動的人；而針對人類行動作出意向性的解釋，就是將信念與慾望賦予行動者（2004: 4-5）。相對的，Callinicos聲稱不對社會結構提出形式性定義（2004: 39），但他援引Margaret Archer（1988）和Anthony Giddens（1979）的觀點，認為結構是**自主獨立**（於人類行動者）、**事先存在**（但會演變）、具有**因果效力**的實體，也是具有**系統整合**效果的**關係**。結構概念的提出，實有助於說明社會之相對穩定性、規律性、層級構造，以及社會各部分互賴且彼此和諧或衝突的特質。基於馬克思主義立場，Callinicos關切的具體結構，乃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所組成的生產方式。總之，Callinicos以簡潔的方式，嘗試既保持結構與行動的二元性，又通過結構能力來扣接雙方。在具體的歷史情境裡，他關注的是資本主義社會中，由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構成的結構及其動態，由階級利益與鬥爭主導的行動，以及社會轉型的可能。

後文依序介紹葉啟政、林文源，以及謝國雄的觀點，指出他們建構本土行動理論的異同之處，討論其理論進路與核心概念。最後，本文提出參照批判實在論的綜合比較與評論，主張他們各自以其方式豐富且啓發了本地社會研究。但他們可能過於強調行動與抵抗，在批判僵化的結構概念之餘，有消解了結構存有論的探討，將結構化約為行動的效果，造成結構概念的理論化不足等限制。

二、抵拒結構巨靈的東方修養出路

臺灣大學社會系退休教授葉啓政（現任職於世新大學社會心理系），長年關注臺灣社會學之知識發展及本土化課題，著述甚豐（葉啓政 1991, 2000, 2001, 2005, 2008, 2009）。他詳細爬梳西方社會學理論之核心概念及侷限，並援引東方儒佛思想養分，探索反思與跳脫西方社會思想框架之路，對臺灣學界有深遠影響，備受肯定。² 眾多著作中，《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2000年初版，2004年修訂版，後文簡稱《「結構—行動」的困境》）集中處理了結構與行動的關係，提出修養與孤獨作為替代出路，是本文討論重點。

葉啓政在針對本土化議題的最新論著中，指出本土化：

基本上是一個關涉到具知識社會學之反省批判的實踐課題。……「本土化」基本上即是，針對著「現代化」而至「全球化」歷史演進過程，一個認知主體在經營知識的過程中，所展現一種具「歷史—文化質性」之迴轉反省工夫的社會實踐行動。……涉及的是研究者的認知取向與再概念化（或謂二度詮釋）的問題……。人們強調的是形塑、並確立得以讓人們（特指研究者）逼近世界的一種身心狀態、文化感知模式、與對時代氛圍的適當定位（與選擇）的問題。其中，我們最可能、且必須做的是，從中爬梳整個可能內涵或衍生的核心文化意義。

（2009: 15）

² 葉啓政的影響，可參見鄒川雄、蘇峰山編（2009）之葉啓政教授榮退研討會論文集。關於葉啓政的生平與思想發展，參見由葉啓政口述，何榮幸執筆的傳記（2013）。

他認為，面臨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壓境，須仰仗本地文化、立足特殊生活處境而孕育的獨立性。知識分子的本土化實踐，不能只是尋求本土之區域特性的經驗實徵，還要「為西方現代性優勢所主導的整個人類文明歷史，注入另一股足以導引『質變』的迴轉力量。」更甚者，本土化實踐有助於掌握當前西方文明霸權的特殊歷史性質及病症，迴轉出有「摩盪攻錯」作用之「治療」意義的文化內涵（葉啓政 2009: 20-1）。

《「結構—行動」的困境》正是一部知識社會學與文化療癒使命的力作。該書核心論點為：西方於資產階級崛起、現代國家形成、市民社會萌發的歷史進程中，在知識與思想上逐漸塑造出一種外部化、對象化，乃至於概化、巨靈化、僵化的「社會」概念。這種源自特殊文化條件的理性、體系化、結構性的社會觀，挾著西方力量拓展，攀升至普世認識方式的地位。即使有個體化、日常生活觀、實踐論，以及各種接合或跨越結構與行動（以及客觀和主觀）之二元分立的嘗試，依然無法撼動理性化、客體化之結構的地位。我們必須徹底反省這宛如巨靈的西方社會結構觀，回到本土文化脈絡，借鑒孤獨與修養實作，方能尋得解脫出路。

葉啓政於書中耗用大量篇幅，點評西方社會和結構概念的缺失，認為理性巨靈將社會現實建構且誤識為經驗性的實在與秩序，但實為虛幻。至於化解或克服主客對立的各種企圖（如Anthony Giddens, Margaret Archer, Pierre Bourdieu等人的嘗試），都無法奏效，因為與結構對照的施為、行動、實踐，甚至意識等概念，往往皆已客體化、對象化或實體化了，或已然涉入且預設了結構（葉啓政 2000: 368），失去活潑的自主性。即使採納關係性（relational）觀點以脫離實體論觀點（從「社會」轉變為「社會的」），強調非實體、動態、過程、構作的社會觀和結構觀，也有所不足；因為「關係」還是停留在跨越個體的結構層次，未能將重點徹底放在「人」身上（葉啓政 2000: 439-40）。

於是，葉啓政將西方各種結構與社會概念斥為虛妄，批評超越主客對立的多樣努力皆不夠徹底。他主張，若要保證他所認定的徹底以人為核心，以及不受結構約制的自由自主個體，應以孤獨和修養為出路。他引述佛家語，認為人的生命是不斷「精進」的創衍過程；人是使人為營造出來的虛擬秩序，有可能轉化為真實的**唯一擔綱者**和**唯一研判者**（葉啓政 2000: 468）。換言之，社會為虛，若感受為實，乃人力所為。這種以**空虛**為生命之本質起點，反對實體化和占有，又極度重視個人本身之能動與思辨能力的觀點，遂歸結為斷開實有化之外界、拋卻他我之支持與外控範限的**孤獨存在**，以及內省式的精進**修養工夫**了。簡言之，葉啓政倡議的本土行動理論，乃是以孤獨之心境或態度來拋卻我執與占有，清澈反思，持之以恆地自律修養、修為潛能，藉以超越社會與結構力量的框限。他強調，這是避免硬碰硬帶來的剛性反彈，創造其他可能性的弱者哲學（葉啓政 2000: 563-5），強調搓揉撥弄、拿捏分寸、順水推舟、借力使力。在這種觀點下，結構一詞所鋪展的只是偶然外在條件，是一種「**緣便**」軌跡，有待洞識的勢與機（葉啓政 2000: 568-9）。

顧忠華曾批評，葉啓政戮力區別西方與非西方社會（概念），主張必須有依存於不同歷史文化脈絡的社會觀。但一方面，非西方社會的現實情境早已深受西方勢力影響，如何可能有全然獨立於西方之外的理論概念；另一方面，葉啓政受制於他自己認定的本土界限，削弱了其理論思考跨越各種地理、文化藩籬的力道（顧忠華 2001: 244-5）。這項批評牽涉了普遍（抽象理論）與特殊（具體脈絡）的張力：若理論依存於現實（概念源於具體脈絡），那麼，東方社會的西化現實似乎無法支撐新理論；然而，若觀念不受制於本土脈絡，則能有普遍適用性。顧忠華暗示了理論本然的普遍與抽象特質，不能自限於本土或文明邊界。

我認為，普遍理論和具體脈絡的區分有其道理，但葉啓政的論證還

有其他侷限。首先，他將西方的社會與結構概念安置於特定歷史條件下，以便說明其文化特殊性，卻未能「對稱地」以相同份量處理東方修養觀念萌發與成立的具體脈絡和歷史條件，使得孤獨和修養的倡議，淪為規範性主張，而非社會學分析。³ 其次，葉啓政所論之具自主性的人，強調孤獨心境和修為，力求迴避結構性、外在關係性的牽涉，但這可能使得人的屬性或特質，皆只能從個體上來掌握，失去了社會性；亦即，爲了避免淪為「結構」框限下的「均質人」，卻喪失了「社會人」的定位。再者，孤獨修養之論，就一般理解而言，乃源於士大夫菁英傳統，實有其特定歷史指涉與實踐條件。

第三，葉啓政盡駁西方社會理論的各類結構觀點及超越主客二分的嘗試，尊崇儒佛老莊思想的某些元素，在複製東西方的刻板分界之餘，似乎是化友爲敵，放棄將某些具強健解釋力的西方概念納爲己用的可能。最後，社會分析與實踐能否全然拋卻結構概念（無論視之爲實體化的系統、模式化的動態關係，或相對穩定的作用力），不無疑問。但葉啓政爲了凸顯孤獨修養的自律主體，並徹底批判西方社會的結構觀，似乎放棄了開啓結構概念本身之另類理論化的可能。

三、弱勢行動的位移—佈署過程

葉啓政的孤獨修養論過於菁英導向，流於規範而缺乏經驗上的佐證和體現；相對的，林文源的《看不見的行動能力》，則強調臺灣透

³ 葉啓政於2008年出版的《邁向修養社會學》，書名標榜修養之社會分析的企圖。然而，該書大部分篇幅還是通論西方概念缺失。至於修養概念，則是在評介Michel Foucault的相關論述後，歸返佛儒思想，引述經典文獻爲依據，偏向哲思論證，而較乏立足本地具體脈絡的社會分析。

析治療（洗腎）患者的日常生活處境，並以他個人及受訪者多年的實際經驗為根柢，提出可以同葉啓政的弱者哲學相對照的弱勢者行動能力（agency）理論。再者，相對於葉啓政對於西方各種結構和施為（行動）理論的批駁，以及仰仗東方思維的另闢蹊徑，林文源則有所批評地採納了西方比較成熟的新觀點，將本土理論的建立，奠定於西方主導的國際學術譜系和場域中。

林文源任職於清華大學通識教育中心，長年關注醫療社會學、科技與社會等領域，《看不見的行動能力》為十五年田野研究、親身體驗和參與政策實務的成果，專注於回應弱勢者是否有行動能力的問題。他主張，與其探問**何謂**行動能力，或病患**有無**行動能力，在**哪種意義**下能展現行動能力，不如探問「行動能力在**哪裡**」，亦即討論患者在各種**情境**下的位移行動，以及病患實作如何構成、連結和佈署，進而轉變了體制。簡言之，要討論的是弱勢者行動能力的動態**配置與轉變**（2014: 4-5）。於是，這可說是將行動能力的實體或本質存有論、類型和知識論問題，轉化為行動能力之**實作樣態與效應**議題的嘗試，亦即以強調動態、過程及關係的**行動本體論**為根據，反對靜態且實體化的本體觀。

《看不見的行動能力》要旨簡述如下：透析患者置身多重情境和實作中，其既被動又主動的存在，涉及身體、器物、制度、符號、再現的中介、交錯與接合，無法化約為單一實體，而其行動能力正存在於這些漂移（drift）中的實作，以及實作中的漂移（林文源 2014: 153-4）。病患行動能力雖然經常隱而不顯，但往往在例行的透析實作無法順利進展時，會問題化原本狀況，重新配置而生成新的存在樣態和實作，例如：混入另類療法，嘗試各種實作的混種，然後再度穩定。病患行動能力的位移（displacement）與再配置，遂展現為不同的紋理（texture），可以區分出不同病患類型與歷程，涉及特定物質—空間實作安排、情

境連結方式，以及主體性的配置（2014: 207）。透析病患也會組織團體（腎友會），形成有較大影響力的位移及其安排配置，或說佈署（deployment），促成新策略，並挑戰和轉化了既有體制（regime）。醫療體制並非一種整體的治理結構，而是有著多重競逐的佈署交錯，佈署本身也不源於單一結構或總體計劃（2014: 266），因而有病患組織起集體行動能力而予以協助、轉化、補充、抵抗和創新的可能。然而，隨著病患位移和集體行動能力佈署的體制化（爭取到更多資源和保障），更具資源和優勢的行動者（醫政單位、醫學會）卻會接手制度面的穩定化，迫使病患組織讓出發言權，甚至隱形（2014: 304）。於是，當前的透析體制已被「結構化」為社會事實、霸權和代理者，病患再度遭到「弱勢化」（2014: 363）。

漂移、位移、紋理、佈署和體制，是林文源據以建立弱勢者行動能力理論的主要術語，歸結為他提出的四大對稱性原則、漂移實作本體論、位移行動理論和體制分析方法（表1）。這個理論化企圖，乃奠基於他對行動者網絡理論（Actor-Network Theory, ANT）、軌跡理論、社會世界理論，以及傅柯（Michel Foucault）系譜學的批判性挪用與補充。

簡言之，林文源從本土、邊緣經驗出發來建立理論，但不強調東方與西方、本土與外來的斷裂對立，而是接受混種的現實，令本地經驗和既有理論持續對話。林文源宣稱要放棄靜態結構觀，拋棄結構（以結構處境傾向來解釋行動）與行動（以志願意向來解釋行動）的二元對立，採取偏重關係、動態、過程、非本質化的行動本體論，以及非人類中心的行動者網絡理論為立論基礎。不過，他認為，行動者網絡理論過於強調轉變式行動，偏向於單一霸權網絡和代言，從而主張應看到位移的多重協商與弱勢者的不可見行動。他挪用軌跡行動理論的歷程與多元實作

表 1 弱勢者行動能力理論之立論基礎與構成概念

| | |
|---------|--|
| 四大對稱性原則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行動能力不僅來自單一霸權，也來自多重世界的交錯。 ● 不只研究可見的代理人，也要了解不可見的弱勢者。 ● 線性發展模式只是多元紋理模式之一。 ● 必須追溯行動能力的長期轉化。 |
| 漂移實作本體論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基於行動本體論，考慮邊緣者經驗，提出多重漂移與實作存在架構；弱勢者置身異質中介和連結實作中，既受影響，也發揮影響。 |
| 位移行動理論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位移：面對多重霸權行動影響，病患藉由問題化既有醫療體制中介的行動能力佈署，歷經重新配置、混種、再穩定的實作，位移了既有配置而構成另類行動能力。 ● 佈署：相對於順應變化、邊緣與不可見的位移行動，某些行動能參與競逐、形成穩定而造成較大影響的安排，使不可見的位移成為可見，甚至轉變其他行動者，這種過程與成果稱為行動能力佈署。 ● 紋理：無論位移或佈署，行動者的實作會穩定為情境連結、物質－空間安排，以及不同主體性的具體配置。構成病患具體處境和體制配置的樣態，即行動能力的紋理。 ● 位移和佈署的差異是相對的，構成了一個連續體。 |
| 體制分析方法 |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體制樣貌是由參與競逐的多種佈署交錯而形成的紋理樣態構成。行動能力和體制是從不同角度定位的同形構成。 ● 體制分析方法乃用於描述體制／行動能力紋理的變化，掌握病患行動能力和體制佈署的共構與轉變。描繪行動能力的紋理，也同時是描繪體制的紋理。 |

資料來源：整理自林文源（2014: 25-6）。

概念，但批評其預設單一社會過程，以及個體與集體行動的二元論。林文源也挪取社會世界理論的多重真實、情境分析和多元論述競逐概念，但指責其過度偏重論述，卻忽略了沉默位移與非人行動者的異質實作。最後，他借用系譜學的佈署和體制觀念，但迴避其偏重整體佈署和規訓的缺失，而提出病患介入的佈署競逐（林文源 2014: 371）。

整體而言，林文源強調多元、歧異、開放、變動、關係性的本體論，關注具體情境中介的漂移實作、競逐交錯，及其在位移、紋理和佈署中的穩定化，確實成功告別了他所謂的結構與行動之二元難題。他

認為，既有跨越主客對立的本體論提案，像是Giddens的結構化理論、Bourdieu的習癖概念，或Archer的分層型態發生本體論（morphogenetic ontology），都還是偏向靜態結構觀，過度強調反覆實作及已然結構化的世界，忽略具體現實與行動的不均質開展和複雜變動。另一方面，他批評過去的行動能力，往往被概念化為行動者的獨立力量、歸因於個體意圖，卻無視於行動者的社會性基礎。於是，自主個體對抗著結構處境，遂成為理論的出發點與兩難（林文源 2014: 376-7）。

相對的，林文源為了避免二元論，走向了某種一元論，或者說，呈現為多元存在樣態或連續體的混同一元論。他認為，結構是化約地指稱多種霸權實作**佈署效果**的方式，並非自成一格的物般存在，也非在反覆實作中實現：**結構和行動都是連續性的位移－佈署過程**的一部分，因而無須重新概念化為二元性，再加以調和（林文源 2014: 379）。其實，林文源聲稱他不討論何謂行動能力，而是探討行動能力在哪裡時，不僅避開了對於行動（及結構）本身性質的本體論界定，還將它們替換為行動能力的**效果**。換言之，他以行動能力的差異性效果，來化約或統攝結構與行動，邁向展現為持續變動競逐之**位移－佈署連續體**的混同一元論。

即使林文源不願界定何謂行動能力，只談論行動能力在哪裡，但就其實際的使用方式而論，行動能力實指「具體情境中的實作效果」，是結合結構和行動的中介或統合概念。葉啟政即指出，施為（即林文源所稱的行動能力，agency）

並不是行動者身為一個「人」所具的主願能動性之完整形式本身，而是行動者涉入一組結構之中所展現的一種社會過程性的狀態。……行動（施為）與結構總是以某種形式相互鑲嵌著，而這樣的鑲嵌所以可能，行動（施為）的概念勢必需要擺在

「社會的」層次予以「表象化」（葉啓政 2000: 554-5）。

於是，葉啓政爲了強調自主的人，拋棄了施爲概念；林文源則爲了迴避結構和行動的二元對立，聚焦於統合了結構與行動的行動能力概念，並以**實作效果**來界定（因而有了**位移**概念，位移指涉了行動效果）。然而，爲了避免僵化的結構和行動概念，迴避傾向性解釋與意向性解釋的對立，並強調多元異質的變遷動態，是否就要取消有關結構和行動概念本身的任何討論，取消結構的因果力量（causality）、行動的因果力量、既限制又促成的結構性質，以及人類意向性行動的考察，全代之以行動能力的效果，可能還有待商榷。

再者，在解釋「何以致此」（例如：透析病患爲何要追求另類療法，爲何要重新配置其存在樣態；或者，腎友會的創新佈署爲何在健保體制下如此輕易遭到醫政單位收編）的問題時，若全然拋開在林文源看來，有僵化之虞的傳統結構概念（例如，制度或組織運作邏輯，或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結合），代之以比較彈性而動態的體制概念（其爲多元競逐之佈署交錯而成的紋理），也避談展現爲個人利益、信念與欲望的意向，似乎不太容易回應「何以致此」，而可能會陷入只是細緻描繪多樣之情境化實作與位移佈署效果。再者，爲何新的健保體制得以穩定化，進而產生占有資源及排除特定群體的效果，乃至於體制之穩定性、慣性或惰性及其作用的問題，也似乎不易訴諸作爲多元競逐之混雜裝配的體制概念來回答。當然，林文源或許會主張，體制不可能具有傳統結構概念所標榜的那種慣性和因果力量。

於是，如果林文源強調拆卸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重視多元、開放、變動、過程和非實體化的概念，可說是承繼了尼采、韋伯、傅柯，以及其他後啓蒙論述的譜系，那麼，我們或許可以拿黑格爾、馬克思、

批判實在論等啓蒙譜系的結構與（意向）行動二元實在論、關鍵性因果力量的探求，以及辯證和關係性思考來同他對照。

以Alex Callinicos的觀點來對比，林文源提出的行動能力，在Callinicos看來便是「結構能力」，亦即取決於行動者在主要社會結構中所占有之位置的力量（相對於一般人所擁有的自然或身體力量）（Callinicos 2004: xx）。結構能力概念的提出，試圖結合結構和行動，但並未取消結構與行動概念，以及它們的相對自主性與因果解釋力量。

再者，Callinicos立足於歷史唯物論和辯證法，主張以社會形構和生產方式來掌握的結構概念（2004: 41），以及晚近強調個體之意向、信念和利益，並且同自然區分開來的行動者（與人性）概念，都具有歷史特殊性，是持續演變過程中的特殊展現（2004: 12）。換言之，這個立場保留了結構和行動（者）的因果解釋力量（結構傾向和行動意向），但不預設其有恆定本質，不會淪於林文源擔心的靜態、單一旦物化的結構觀與非歷史性的行動者概念，但保留了因果力量之所繫的二元（生發性）實體化本體。這個馬克思主義立場的二元實在論，也強調矛盾、衝突、變動、複雜和關係性思考，但企圖探尋某種相對根本而普遍的秩序，作為解釋與變革性行動的根據。這或許是值得跟林文源所承繼的系譜對話的另一條理論路線。

四、結構力量呈現樣態與中介行動的大迴路

如果林文源的位移理論，多少偏向於強調複雜、變動且多元的尼采—韋伯傳統，那麼，謝國雄嘗試發展的、具臺灣味的一般理論，則順著他對勞動體制的關注，而植基於馬克思主義的傳承。不過，他對基本文化分類和在地理解範疇的關注，也接續了涂爾幹對於社會分類和集體

表徵的重視。

謝國雄是中研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也是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合聘教授。堪稱謝國雄前輩的葉啟政，於1974年返臺於政大任教，處身箝制思想的威權時期，有所批判地傳授西方新學，也見證民主化和本土化萌芽。後來，他以學者論政建言方式（加入自由派學者為主的澄社），在社會轉型期實踐了他自我期許的知識分子孤獨與修養之道。身為謝國雄後輩的林文源，則是在臺灣民主化和土本化已然滲入日常生活的2005年左右，才展開專業學術生涯。他結合身為透析患者的親身經歷，投身患者權益和醫政改革之路，並受到後啓蒙理論與行動本體論洗禮，以更細膩探討弱勢者的行動能力為理論化焦點。相形之下，謝國雄在1990年回國任職，正逢臺灣社會力急遽迸發，政經劇烈轉型時刻。他專門研究勞動體制，也參與勞工權益運動，但認為必須藉此理解臺灣社會性質的特殊性，對應社會學的基本發問，在宏大而包容萬象的一般社會理論上有所創新。⁴

這樣的關切，引領他自第一本中文專書《純勞動：臺灣勞動體制諸論》（1997）起，便嘗試在扎實的田野研究中探討理論問題，即「社會生活之本體論與知識論的問題」（1997: 302），並與常識斷裂，包括認定社會現象不能化約為個人主觀意願，而是要考察社會條件和位置；從關係的視角來考察社會現象；以及，注重權力的象徵面向和多種呈現方式等（1997: 310）。除了馬克思主義和勞動過程研究，他主要借用

⁴ 謝國雄主編的《群學爭鳴：臺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2008），也是他在這方面糾集群力的成果。他於導論中，重回陳紹馨的提問：臺灣社會的凝聚法則為何？在臺灣歷史上是否經歷了重大改變而呈現出臺灣社會性質的變化？（2008: 11）。他還將臺灣社會學研究的重點，對應到結構與行動、物質論與象徵論的關係，以及反身性（導向社會的重新概念化）等一般問題（2008: 15-7）。

Giddens的結構雙元性、Bourdieu的場域理論，以及涂爾幹的基本文化分類等概念。

更重要的是，謝國雄認為必須置身臺灣歷史中來掌握本土概念（如「分」、「互相」等）的起源、持續和演變（1997: 338）。立足在地經驗，發展本土概念，同時探問基本社會問題，兼顧「臺灣味」與「理論的創新」（1997: 347）的路徑，在他的《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2003）中持續發展和深化，通過社區研究來勾勒整體社會圖像和運作原則。2013年，緣於高雄勞工博物館籌劃和口述影像史訪談的《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後文簡稱《港都百工圖》），是謝國雄通過本地經驗研究貢獻於一般社會理論的成熟作品，也是本文分析重點。

2013年1月正式出版的《港都百工圖》，同年6月號的《臺灣社會學》期刊便登載了四篇書評（作者為許甘霖、藍佩嘉、鄭瑋寧、楊弘任），以及謝國雄（2013b）的回應，顯然是特別籌劃，透露了學界對該書的重視。幾位評者肯定該書立足本土經驗、理論化本土概念，進而將「在地普遍化」、「西方個案化」的貢獻。批評則大多落在特定概念的運用（商品拜物教的型態；剩餘價值剝削和不對等交換的差異；在地理解範疇與存在感的異同）、某些方面討論不足（性別議題；外資；多層文化的連結；幻象、再現與現實的關係），以及精進理論建構的期許（一般行動理論的發展；資本主義在地運作的理論化和整體圖像；多層次實在；動態多重結構觀）等。本文的焦點，則在於謝國雄處理結構與行動之關係，建立一般社會理論的嘗試。

《港都百工圖》的論旨為：高雄置身不同行業和勞資範疇（皮鞋業、鐵路貨物搬運業、計程車業、派報業、電影辯士、唐榮鐵工廠、台塑企業）的各層級勞工，有其建構、認識和體驗勞資範疇的方式，並以

各種在地文化與傳統生活觀念（倩、包、命、剋、因緣觀、平權人觀等）為媒介，來理解資本主義勞資範疇和勞資互動。再者，在捍衛勞動權益的抗爭行動時刻，有順理、順勢、順法等不同鬥爭策略的運用，這也是不同的行動中介結構力量時的呈現樣態（並形成了不同的結構感）。然而，勞工並非只置身於資本主義勞資關係中，也有其生存定位和處境，這便涉及了個人生命史與存在感（謝國雄 2013a: 148）。在这一切面向構築的多重現實（主要涉及資本主義、現代國家，以及家或親屬關係，這三種結構力量及其呈現樣態）及其感受下，謝國雄認為，臺灣的勞工既擁抱商品拜物教，又能看穿商品拜物教（作為資本主義之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涉及對剩餘價值剝削的創造、萃取、掩飾），認識到剩餘價值分配的不公，卻未能徹底超脫與抵抗，甚至進入了資本拜物教（亦即，只有資本才算數）。

謝國雄提出的一般理論，正是要面對前述的複雜現實，考察結構與行動的多重中介關係，其理論要素包括：（一）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二）行動的中介作用；（三）大迴路；以及（四）存在感。首先，結構力量具有「總稱性質」（generic feature），展現為不在個人控制範圍的力量，謝國雄以同源異相、多重關卡、物化、多元、兩面性、隱或顯、歷史性等，來掌握結構力量的特質（謝國雄 2013a: 446）。但結構力量還有其呈現樣態，也就是在行動者眼中看來是什麼樣子；謝國雄就此區分了自然化、預留空間及相對化等不同現身方式。結構力量現身之後，也可能變身，結構力量也可能一直隱身不現，但這不意味著結構力量不存在（謝國雄 2013a: 43-4）。

其次，結構力量的總稱性質和呈現樣態，都必須有行動才得以成形。這便是行動的中介作用，包括：（1）各種行動中介了結構力量，行動必然借助結構力量，又對結構力量做工；（2）作為中介的行動塑

造了結構力量現身、變身、隱身等呈現樣態；以及，（3）行動的中介樣態本身，也會對結構力量產生效應。換言之，謝國雄運用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及行動中介樣態等概念，將行動與結構更緊密地連結起來，並凸顯行動對於結構（力量）的積極作用（中介、塑造其呈現樣態，並藉此對結構產生效應）。即使結構力量宛如勢不可擋，人力所不能為，其實也是特定行動中介下的樣態，是物化、自然化過程受到隱藏或拜物化的結果（謝國雄 2013a: 144-7）。

第三，從既定結構力量的總稱性質、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及其效應、行動作為中介及其中介樣態，中介樣態的效應，再回到結構力量，便構成了「大迴路」：結構力量提供行動者行動空間，行動者對結構力量做工，做工讓結構力量現身、變身、隱身、促動結構力量反制，或改變了結構力量。這裡還涉及物化與去物化的共存。物化是結構力量宛如無法撼動般地發揮作用，或顯得自然而然，不為人所覺察（看似「非結構」），是行動與結構不對稱互構的結果；相對的，去物化是行動者改變了結構力量，是行動與結構的對稱互構（謝國雄 2013a: 147）。

最後，為了探討行動之意義與文化（或馬克思主義所論之意識型態）課題，以及主體性議題，謝國雄在他先前提出的在地理理解範疇（涉及結構呈現樣態）基礎上，試圖探討勞工創造意義的過程與成果，提出了**存在感**概念，它指涉了什麼支撐了我的一生、一生是如何走過來的、過的是什麼樣的生活，人生所為何來等感受、質問和反思（謝國雄 2013a: 39-40）。

謝國雄的理論構思，同林文源一樣，立基於西方既有的相關討論，特別是William Sewell（1992）對於Giddens和Bourdieu的批判性修正，亦即反省過往結構概念過於靜態而無法處理變遷，過度決定了人類行動，也未能超越物質與象徵之二分等缺失，而倡議以文化圖式（schemas）

來替換Giddens的結構作為規則的概念，以此搭配作為資源的結構，並強調探討**結構的不同深度**（結構廣泛滲透而不被意識到、因而被視為當然的程度）。Sewell也強調社會和結構的多重、權變和裂解，以及行動者可以多樣詮釋及動用資源與文化圖式，帶有變動和不可預期性。謝國雄的結構呈現樣態和存在感概念，便具有文化圖式及結構深度（現身、變身、隱身的區別）的意涵。

葉啓政批判各種西方結構概念，導向孤獨修養的主體能動性；林文源運用「行動能力」概念來超越結構和行動的二分，建立了位移—佈置連續體及其多重競逐的紋理。相較於前兩者對於行動概念的偏重，以及拋棄被靜態化與物化看待的結構概念，謝國雄的結構力量—中介行動大迴路，似乎比較能同等看待結構和行動的作用與效應，企圖以「結構力量呈現樣態」來挽救僵化而單一的結構概念，並將此概念直接連結上行動中介作用（中介的行動塑造了結構力量呈現樣態），以便同時強調結構的變遷之源，以及行動的積極作用。

不過，謝國雄在論證中，往往是以結構力量來替代結構概念本身，看似強調了結構的強大作用力，但其實和林文源的行動能力概念有點類似，以其「效應」和「位於何處」的關注，避開了**結構究竟為何**（以及行動究係為何）的本體論探討。若和批判實在論（例如Archer 1988和Callinicos 2004）主張的結構與行動之雙重實體觀相對照，謝國雄在結構是不是一個獨立實體⁵的立場上，顯得有點模糊。有時候，他預設了資本主義、現代國家、親屬關係等結構力量有其本體性的實存、構造和

⁵ 指稱結構為獨立的實體，有其發揮作用或力量的能動性，並不意味結構就是單一的，或者結構是靜態而無法改變的。換言之，對於結構具有多重性、變動性，具有過程和關係性質的主張，並不需要取消結構本身的能動性，而將其僅僅歸諸行動者的能動性（行動能力或中介作用）。

運作機制；但有時候，他似乎又避開了結構本身的討論，轉而討論行動者所感知和中介的結構呈現樣態，或是將結構當成在地理範疇和存在感所預設的彼方。於是，這裡有兩種可能的詮釋，亦即，結構是一種具有因果力量的實體，或者，結構的（擬似實體）存在乃取決於其呈現樣態（涉及人類對此樣態的感知）和效應（涉及人類行動的中介）。換個方式說，謝國雄的大哉問是「社會是什麼？」，就此，他提出釐清「整體社會圖像」的關切。然而，整體社會圖像到底是立基於資本主義、國家、親屬關係等制度或組織的多重結構實存和轉變機制，還是從理解範疇、結構呈現樣態及日常實作中浮顯與體現出來？再者，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或親屬制度，它們各自的結構特徵為何，彼此間的關聯如何，似乎都還有待進一步追問。

於是，謝國雄的整體計劃，還是比較偏向於致力將行動（者）的作用（中介、塑造呈現樣態而對結構做工，產生效應）與感受（結構感、存在感）抬高，來抗衡遭批評為靜態僵滯的結構。或者說，謝國雄的結構概念之所以能重構為動態、多重而變動的過程，都是因為導入了更積極的行動概念。

總之，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是極具啟發性的概念，但謝國雄幾乎將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無論現身、變身或隱身），都歸諸行動的中介作用，而非如批判實在論般，考察結構本身的構造，以及這種構造所具有的因果力量。誠然，這麼做可以增添分析的豐富度，看到行動者之行動和感知（呈現樣態乃行動者眼中的結構力量模樣）的必然中介作用，以及後續效應（呈現樣態對於結構力量有所作用，構成結構力量的一環），從而串起結構和行動。然而，結構力量的呈現樣態是否只能歸諸行動，或者，也有來自結構力量（之總稱性質）的能動性；亦即，呈現樣態不只源於行動者如何感知與行動，也來自結構本身的特性。甚至，

在沒有行動、沒有行動者感知的狀態下，結構依然有其運作力量和呈現樣態，這樣的可能性也值得探索，作為揭顯行動之所以可能或不可能的（結構性）條件的一種方式。

反過來說，若為了強調行動的中介力量，以及結構與行動的相生相剋，從而泯除了結構與行動的實體二分，那麼，除了有時會過於偏向行動建構力量而有行動化約論的危險，也可能因為讓行動通過塑造結構呈現樣態而展現其中介力量，反而令行動內蘊於結構（亦即，行動效應成了結構力量的內容），而破壞了行動的自主性。因為行動自主性，有時候很弔詭地展現於它與結構力量的脫節或不相干；若是有關行動中介力量的討論，全都繫繫於其塑造結構之呈現樣態和效應，反而有將行動化約至結構這個範疇的危險。於是，既要強調雙方的密切關聯，又不相互化約，那麼結構與行動的雙元（及衍生之多元）實體觀及其本體論考察，或許也是個可能出路。

五、比較與評估

晚近臺灣學界，特別是科技與社會研究領域，開始採納行動者網絡理論及其行動本體論。至於關係性思考和動態過程論的主張，也已受到批判立場學者的普遍採納。另一方面，1980年代晚期以來，因得後結構主義哲學之支撐而蔚為流行的社會建構論，則遭批評為輕忽了論述以外的物質現實，宛如唯有論述或表意系統，才有主動建構力量。至於批判實在論，則有自然主義方法論立場，以及同實證主義的曖昧關係，因而在其（深層）結構與（經驗）表象之分，以及行動和結構雙元實體論上，遭到過於僵化、先驗且不具歷史性的質疑，以及忽略了知識的社會建構等批評。於是，行動者網絡理論似乎成為超脫批判實在論和社會建

構論之各有所偏的新出路。例如，鄭斐文（2013）便以肥胖身體研究為例，區分了這三種立場。

然而，批判實在論並不排除論述的建構作用及其對知識的中介，也不排除實在的多元層次和歷史變動的可能。換言之，批判實在論的存有論，並非全然是靜態而本質性的，但它不主張混淆存有論和認識論這兩個層次。批判實在論也認為，有可能區辨不同實在的存有性質，而非將實在概念轉化為多重裝配或網絡的效果或效應，這是它與行動者網絡理論的主要差異。我認為，批判實在論還是一個有效的理論化路徑，而不能輕易以行動者網絡理論和關係動態思考來取代之。

接下來，我將更有系統地比較葉啓政、林文源和謝國雄的理論化努力，並再次提出一些基於批判實在論、特別是Callinicos觀點的評估，來與行動者網絡理論及關係性思考對照。表2摘述了葉啓政、林文源和謝國雄的一般本土行動的理論化路徑，羅列其核心概念、有關結構和行動的立論、理論化計劃及經驗研究定位等基本論證，作為討論的基礎。

首先，我們可以注意到，這三位學者的本土理論建立依據，或說其本土的指涉內涵，有著本土思想或本地經驗的差異。葉啓政的知識社會學批判路徑，使其偏向於掌握整體論式的文化特質，是大傳統式的儒道和佛教思維或心性（從而預設了西方與東方之分野），而非日常生活中，鑲嵌於社會關係與常民經驗中的觀念與心態。相對的，林文源和謝國雄皆關注當代臺灣社會中，特殊群體在特定脈絡下的經驗與實作。於是，這裡的本土內涵呈現了抽象化概念和具體經驗的脫鉤。不過，謝國雄的存在感與在地理理解範疇，或許有助於在整體文化特徵（圖式）和具體經驗之間搭建橋梁，建立多層次的分析架構。

其次，順著謝國雄的在地理理解範疇，我們也能注意到，三位學者在面對西方理論時的差異態度。葉啓政為了大開大闢的建立本土（東方）

表 2 三種本土行動理論的路徑

| | | | |
|------------------|--|--|---|
| 路徑 | 葉啟政： 知識社會學批判與內 省修養行動 | 林文源： 漂移實作本體論與位 移行動理論 | 謝國雄： 結構力量－呈現樣 態－中介行動的大迴 路 |
| 核心 概念 | 超越主客對立與結構 巨靈、孤獨、修養 | 對稱性原則、漂移實 作本體論、位移行動 理論、紋理、佈署、 體制分析方法 | 結構力量的總稱性質 與呈現樣態、行動中 介論、存在感、在地 理解範疇、大迴路、 物化、去物化、整體 社會圖像 |
| 「結構」概念 | 批判理性化、客體化 之巨靈般的社會結 構；質疑關係性的結 構觀；主張結構只是 緣便的軌跡、勢與機 | 批判與行動對立的實 體化結構；主張社會 結構混雜於中介和位 移的行動本體中；改 用不具物般本體地位 的體制概念來描述相 對穩定的態勢 | 保留結構概念，但強 調結構的多重性和變 動，以及由行動者這 方來覺察和中介的結 構呈現樣態與結構力 量 |
| 「行動」概念 | 拿捏分寸、搓揉摩盪 的弱者哲學；孤獨心 境的修養貞定 | 弱勢者的漂移實作； 轉變體制的位移 | 中介了結構力量，塑 造其呈現樣態；反抗 勞資關係；追尋存在 感 |
| 結構與行動之 關係的論證 | 強調脫離結構的範 限，邁向孤獨的修養 | 消弭結構與行動二元 論，邁向位移－佈 署－體制連續體及其 多重紋理 | 以結構力量呈現樣 態、中介行動及存在 感來接合結構與行 動，克服二元分立 |
| 理論計劃與經 驗研究之地位 | 批判性檢視西方理論 之歷史特殊性及其存 有論與認識論侷限； 挪用東方思維來建立 本土理論，但較乏經 驗研究 | 以本地經驗將西方理 論置入脈絡，予以補 充和發展；提出有在 地經驗為基礎但普遍 適用的新理論 | 通過本地經驗研究， 與西方理論對話，藉 以建立本土理論；通 過在地普遍化，將西 方個案化 |
| 本地關切 | 倡議本地歷史文化脈 絡下的思想與實作 | 關注本地的弱勢者經 驗 | 建構本地的經驗、理 解範疇和存在感 |

的替代視野，力排西方理論，但在過程中不得不與之對話（提出批判）。林文源則直接大幅挪用既有西方概念，如位移、紋理、佈署、體制等，搭建自己的理論架構。相對的，謝國雄雖然也取經於西方既有理

論、概念和發問方式，但很在意建立本土文化範疇，以及將庶民日常用語（剋、命、倩等）予以理論化，同樣具有搭建橋梁的企圖。

立足於西方經驗的西方理論，以其抽象化力量試圖掌握人類社會的共通性，但面對歷史積澱的差異而力有未逮。然而，本地歷史與脈絡的差異，卻無法全然否定西方霸權主導性，以及西方理論在掌握人類共通性時的一定成效。因此，無論是出於與霸權對話（協作、挪用、批判）的必要，或是借用西方理論已然掌握的人類共通性為出發點，都無法迴避西方觀點。於是，從牽涉利益與存在價值的本地經驗出發，發展出本地文化範疇和理論概念，並貢獻於社會分析的全球事業（特別是謝國雄在意的，社會學基本問題的在地回答及普世貢獻），與挪用和借鑑西方（本身也是多樣的本土）觀點，應該不相違背。但是，謝國雄的進路相較於葉啓政和林文源，或許格外能提醒我們這兩端之間的張力，亦即提示了普遍與特殊、全球與在地之間的二元性。

這種含有張力的二元性，其實也是批判實在論之結構與行動雙元實體觀（結構和行動皆具備自主性和因果力量，彼此密切相關，但不能相互化約）的基礎。就此，我們可以看到葉啓政嘗試迴避這種二元觀點，力陳孤獨修養主體的核心地位與能動性。但他傾向於弱者哲學的拿捏分寸、搓揉摩盪，實則預設了一個強大的、無法正面對決的結構性存在。換言之，葉啓政大力強調主體能動性和自主性，正是因為面臨了無法抗拒又試圖加以抗衡的結構。這反而是一種暗藏的，將行動和結構都推向極端的結構與行動二元論。

林文源也嘗試避開結構與行動的二元論，代之以位移－佈署連續體的混同一元論觀點。然而，他之所以提出這種迴避策略，實則是他將結構視為靜態約束，將行動視為孤立個體意志的結果。換言之，他提出既有結構與行動概念的缺陷，卻忽略了結構與行動或許都可以有更好的概

念化（動態的、具歷史特殊性的能動實體），並可以通過類似Callinicos的結構能力⁶概念來結合，避免兩方的斷裂。因此，林文源雖然很好的掌握了弱勢病患之位移實作的行動能力，以及位移能改變佈署和紋理的效應，也就是掌握了「行動的結構效應」，卻無法充分理論化「結構的行動效應」（亦即，體制對於行動者的作用），因為他暗中拋棄了結構的本體存在和因果力量，將結構轉化為只是多重行動者實作的積澱產物（紋理、佈署、體制等），結構概念遂淪為某種消極又僵化的行動背景或框架，而有待拋棄了。

相對的，謝國雄的架構嘗試以「結構力量－呈現樣態－中介行動的大迴路」，來跨越結構與行動的二元對立，卻跟林文源的位移－佈署連續體觀點不同，比較多的保留了結構的理論地位，並以結構力量這個概念來呈現（相對於林文源的行動能力概念）。不過，如前所述，謝國雄雖預設了國家、資本主義和家（親屬關係）等結構實存，但他在建立理論時，比較多的討論了結構力量（結構的行動效應）、結構呈現樣態（文化範疇與感知），以及行動的中介效應，而非探討結構本身的實存性質與演變。雖然他在《茶鄉社會誌》和《港都百工圖》中，都有通過經驗研究來掌握社會結構及其變遷的嘗試，但這些討論往往比較像是對於社會整體圖像的追尋，而非嚴格的社會結構之構造、生成與轉變機制的分析。因此，雖然謝國雄的架構比起葉啓政和林文源，可能更為接近

⁶ 這裡要再度澄清容易混淆的，Callinicos的「結構能力」，以及謝國雄的「結構力量」概念的差別。結構能力是指人類行動者因為處於特定社會結構位置而具備的能力，這是將人類行動能力置於結構位置上來考慮；但是，這並不否認人類具有意向、慾望、信念和價值，並必須根據這些來理解人類行動。結構力量則是指，特定結構所具備的約束與促成的力量。

批判實在論，但還是在本土社會結構特質的理論化上，有待深化。⁷

面臨西方理論的霸權，以及整個被視為源自西方的資本主義和現代性體制的壓境，我們確實需要立足於本土經驗來與這些力量對話。同時，也確實需要格外強調結構與行動之關係中的行動面，寄望其抗衡、反撲、改造（西方現代）結構的潛能。然而，回到結構與行動之關係的這組社會學基本提問，我們在辨識主體行動能力的潛能和效果之餘，可能也需要掌握行動的條件，以及行動目標的生成。

行動之所以可能的條件為何，其分析乃立足於對於（無論如何界定之）結構的認識。當代社會，結構已然是多層次的，⁸ 包含了全球、西方、區域、國家、城市，乃至於機構、制度、文化或思維邏輯等不同尺度和面向。至於行動目標的生成，除了涉及政治與倫理的考慮（善惡之辨、社會該往何處去，理想生活狀況為何等課題），也牽涉了結構的考察，因為（集體的）行動目標，往往在於邁向塑造一種新的存在秩序，也就是一種新的、比較適合人類生存的相對穩定狀態與運作邏輯，而這或許還是可以用結構一詞來涵蓋。

⁷ 雖然學界有不少涉及臺灣社會性質的討論，可說是掌握本地結構特徵的嘗試，像是威權侍從體制、依賴發展、發展型國家、新政商關係（大小夥伴關係）、威權民粹主義、新自由主義化治理等試圖掌握國家和社會之結構性關係的概念；或是，經濟領域中的外包制、擬似親屬關係、生產方式之連屬等概念；或者，謝國雄在《茶鄉社會誌》中回顧的，始自陳紹馨之臺灣社會整合原則的提問，凝聚法則、祭祀圈、社會性邏輯、人際紐帶等概念。但是，這些概念雖有部分立足於本地經驗，但大多數還是接枝於西方或拉丁美洲經驗，或者太專注於國家、或國家與統治階級的性質，而較少論及文化、經濟與社會各面向及其間關係，也尚未充分連結上結構與行動之關係的一般討論。

⁸ 或者，如López and Scott（2000）所論，結構有許多種概念化的可能，視之為有機體、系統、場域、層級、關係或網絡等，各有不同的分析功用。

總之，本文評述的三位作者，各自有不同關切，但都立足於結構和行動之關係的問題意識上，提出了極佳的本土研究成果。他們超脫僵化的結構觀及其侷限，建立更動態、活潑且能掌握本地經驗之理論架構的努力，值得學界認真看待。然而，本文通過批判實在論的參照，指出他們的共同限制在於：由於對結構概念戒慎恐懼，以及爲了強調行動的可能性，從而傾向於將結構非實體化或效應化，相對忽視了以結構一詞所能掌握的制度慣性、系統性變遷機制及其因果力量。

因此，相對於葉啓政、林文源和謝國雄在凸顯本土行動上的理論化成就，我們必須以同等努力，致力於本土結構之經驗和概念的理論化。而且，這種結構與行動並重的雙重焦點，除了借用行動者網絡理論和關係性思考的混同一元論或多元論取向外，或許也可以借鏡批判實在論具有辯證觀點的雙元實體論進路。

作者簡介

王志弘，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興趣爲都市文化治理、自然治理，以及移動政治。近期研究領域爲臺北都會區的水岸轉型，以及人與動物關係的空間構成。

參考書目

- 林文源，2014，《看不見的行動能力：從行動者網絡到位移理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許甘霖，2013，〈剩餘價值或是不對等交換？幾點質疑〉。《台灣社會學》25: 163-166。
- 湯志傑，2008，〈本土社會學傳統的建構與重構——理念、傳承與實踐〉。頁553-630，收錄於謝國雄主編，《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
- 楊弘任，2013，〈勞動現場的反身寫實與在地範疇的存在感〉。《台灣社會學》25: 182-191。
- 葉啓政，1991，《制度化的社會邏輯》。台北市：東大。
- ，2000，《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與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論述對話》。台北市：三民。
- ，2001，《社會學和本土化》。台北市：巨流。
- ，2005，《觀念巴別塔：當代社會學的迷思》。台北市：群學。
- ，2008，《邁向修養社會學》。台北市：三民。
- ，2009，〈全球化趨勢下學術研究「本土化」的戲目〉。頁1-25，收錄於鄒川雄、蘇峰山編，《社會科學本土化之反思與前瞻：慶祝葉啓政教授榮退論文集》。嘉義縣：南華大學社會教育研究所。
- 葉啓政主述、何榮幸執筆，2013，《予于蹟頓七十年：恰似末代武士的一生》。台北市：遠流。
- 鄭斐文，2013，〈社會建構論、批判實在論與行動者網絡理論觀點下的身體與社會：以肥胖議題為例〉。《臺灣社會學刊》53: 143-182。
- 鄭瑋寧，2013，〈在反思性斷裂與批判性回歸的辯證路徑上，探尋新知

- 識的可能：評述《港都百工圖》〉。《台灣社會學》25: 171-181。
- 謝國雄，1997，《純勞動：台灣勞動體制諸論》。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籌備處。
- ，2003，《茶鄉社會誌：工資、政府與整體社會範疇》。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13a，《港都百工圖：商品拜物教的實踐與逆轉》。台北市：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2013b，〈資本主義、台灣社會與社會現象之建構：總結與回應〉。《台灣社會學》25: 192-205。
- 謝國雄主編，2008，《群學爭鳴：台灣社會學發展史，1945-2005》。台北市：群學。
- 藍佩嘉，2013，〈資本主義、文化運作與性別認同：《港都百工圖》的未竟之業〉。《台灣社會學》25: 167-170。
- 顧忠華，2001，〈評葉啟政著《進出「結構——行動」的困境》〉。《台灣社會學》1: 241-245。
- Archer, Margaret, 1988, *Culture and Agency: The Place of Culture in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Callinicos, Alex, 2004, *Making History: Agency,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Social Theory* (2nd ed.). Leiden, The Netherlands: Koninklijke Brill NV.
- Giddens, Anthony, 1979,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oseph, Jonathan and John Michael Roberts, 2004, "Introduction: Realism, Discourse and Deconstruction." Pp. 1-19 in *Realism Discourse and Deconstruction*, edited by Jonathan Joseph and John Michael Roberts. London: Routledge.

- López, José and John Scott, 2000, *Social Structure*. Buckingham,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 Nielsen, Peter, 2007, "Critical Realism." Pp. 96-105 in *Dictionary of Critical Realism*, edited by Mervyn Hartwig. London: Routledge.
- Sewell, William H. Jr., 1992, "A Theory of Structure: Duality, Agency and Transform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1): 1-29.